

杨寿楠及其时代

潘 崇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摘要] 杨寿楠出身无锡名门,虽有科考经历,但并非科举正途入仕,而是凭借青年时期积累的良好财政素养,活跃于清末民国时期的政界和实业界。尽管杨寿楠仕途生涯表面上看似顺利,但个人理想追求和动荡社会现实之间的桎梏不适,造成其内心深处始终萦绕着挥之不去的失落彷徨。最终,阅尽官场暖凉的杨寿楠辞官归隐,以著书立说渡过人生晚景。杨寿楠个体生命历程之曲折表明,清末民初历史转折时期读书人的价值观念发生诸多新变动,政局机陞不安成为制约个人理想事功的最大障碍。

[关键词] 杨寿楠;清末民初;科举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8)02-0047-08

人物是历史的主角和灵魂,人物研究是历史研究的永恒主题。已故著名史家来新夏先生曾这样言及人物研究的选择标准:“一个人在他所处的时代,做好他应该做的事,并对社会、对人类、对历史有所贡献,就应给以注意。”^[1] 本文传主杨寿楠,即是一位在他所处时代做出了值得记述的贡献,但却没有得到学界应有关注的历史人物。^① 杨寿楠生于1868年,卒于1948年,一生跨越晚清民国时期,活跃于政界和实业界。与大多数步入仕途的知识分子一样,杨氏以观风颺国为己任,其所撰《苓泉居士自订年谱》,始自生年,终于民国丁卯年(1927年),首尾凡60年,不仅记录了其参与重大历史事件的经过,同时也记录了他眼中的政治变动和国势民运,当然字里行间更是展示出他对个人生存状况、命运走向的所思所想及其抉择过程。这正如其言:“世运之平陂,国事之治乱,一身之升沉显晦,悉具其中矣。”^{[2]309} 本文即基于个体生命与社会变迁之关系的视角,以杨寿楠人生经历为线索,探讨他不同时期的生存状态及其观念理想的变动情况,以期从个案角度深化我们对清末民初时代变局的认识。

一、江南学子多才俊

杨寿楠,原名寿棫,字味云,晚号苓泉居士,江苏无锡人,1868年农历8月21日出生。杨家为无

锡名门望族,世代固守儒业。杨寿楠六世祖杨度汪,乾隆朝以博学鸿词入翰林,遂以“鸿博第”闻名乡里。^{[2]243} 祖父杨延俊为道光年间进士,曾任山东肥城县等县知县。杨延俊生子五人,杨寿楠之父宗济行四,字用舟,1865年补博士弟子员,1879年选授江苏溧阳训导。^{[3]136} 出生于这样一个诗书世家,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光耀门庭,无疑是摆在杨寿楠面前超乎个人层面而带有家族寄托的重大使命。

幼年时期的杨寿楠聪慧好学,由于父亲为宦异乡,他四岁起在母亲教导下学习识字,“日能记三十余字”。^{[2]244} 五岁后开始家塾教育,学习《大学》,六岁学习《中庸》、《论语》,七岁学习《孟子》,并习课对,八岁学习《诗经》、《尚书》、《周易》,并学习作诗,九岁学习《周礼》、《尔雅》、《礼记》,十岁学习《左传》、《资治通鉴》、《文选》等。及至青年时期,杨寿楠与唐文治、姚鹏图、陆增炜等人同学于著名的娄东书院。娄江之畔的娄东书院,是清代太仓地区的著名学府,一大批硕学鸿儒、著名学者主讲于此。^[4] 总的看,杨寿楠青少年时期学习勤奋,“博涉文史”、“才藻冠时”,是同侪中的佼佼者。^{[5]96} 杨寿楠既具有家庭背景的优势,又不乏后天的个人努力,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就杨寿楠自己来说,其对科举考试亦是志在必得,曾在年谱中

[收稿日期] 2017-09-21

[作者简介] 潘崇(1981-),男,河北保定人,历史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清末新政史、清末政治人物研究。

记道：“少年志盛气锐，视科第如拾芥。”^{[2]253}

在传统中国社会，科举考试是读书人谋求社会阶层变动的主要途径，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读书人重要的价值追求和文化观念。然而，科举考试本就竞争激烈，同时也充满着偶然因素，加之清末捐纳盛行以致仕途壅塞，对于科举入仕谁也难有十足把握。杨寿楠科考经历起初还是比较顺利的。1882年，年仅15岁的杨寿楠首次参加科考，县试21名、府试35名，次年应院试，取列第9名。但好运到此似乎就戛然而止了。1888年，21岁的杨寿楠应乡试，“荐而未售”，次年再考，则又因“堂备额满见遗”。^{[2]249-251}直到24岁，终于取列顺天乡试第72名。然而，更重要的会试则又不顺利。1892年农历三月应会试不售；1894年农历二月应恩科会试，又不售；1895年应会试，荐而未售。在经历长达13年的科考之路后，28岁杨寿楠亦是身心俱疲，逐渐对科举考试失去热情乃至信心，加之父亲病重，遂奉亲课子，闭户读书，不复参加举业。

之所以杨寿楠对科举的态度发生转向，自然与其会试屡试未中不无关联，此外亦有两个原因。一是同侪的劝言。1893年，杨寿楠编辑十年来所作诗文，成《红树山庄诗文集》，同乡杨模（字范甫）题其后，在称赞诗文的同时，警示“吾辈事业尚有大者远者，但以文人自命，非吾所望于君也”。此言对杨寿楠触动极大，杨自称“余惕然悟”，遂于是年起在继续准备科考的同时，“始治经世学”。^{[2]257}另外一个更重要原因则是时局的剧烈变动。这一变动，即是1894年中日两国间爆发的甲午战争，杨寿楠在年谱中记道：“我陆海军屡衄，旅顺、大连相继失守，都城戒严，大驾有西狩之说，京官纷纷迁避。……余则护眷属择地避兵，是冬朝市萧条，风鹤数警。”这种局势推动杨寿楠救国志向之萌生：“目击时艰，慨然有投笔请缨之志，不复治科举业矣。”^{[2]258-259}

然而，不治科举，又当何为？人总要为自己的前途未来做出打算。作为一个较少受到西潮直接冲击的读书人，如何调适内心期许与社会变迁的合拍，是杨寿楠和他同时代同境遇的读书人普遍面临的挑战。在这一问题上，杨寿楠一时颇显迷惘，他在1895年会试第三次失利后写道：“睹时局之陆危，念名场之蹭蹬，自顾身世，不禁蒿目灰心也。”^{[2]259}其当时心境由此可见一斑。值得庆幸的是，杨寿楠经过短暂的纠结之后，很快修正之前追

求“制艺之学”的读书取向，从1896年起转而“一意讲经世学”，^{[6]233}这是影响其人生发展路向的重大抉择。杨寿楠在该年年谱中记道：“是年起，始摒弃举业，专治史学，尤肆力于财政一门。历史及九通中钱币、赋税、盐法、漕运各门，皆分门别类，提要钩玄，纂录至数十万言，积成数巨册。生平于财政略窥门径，盖得力于此两年中也。”^{[2]260}

1898年，31岁的杨寿楠入时任山西巡抚胡蘅生幕府，“主内文案”，“治文书不通宾客者数月”。^{[2]261}杨寿楠得以入晋抚之幕，缘于其伯父杨宗濂（字艺芳）之举荐，杨寿楠之子杨景燧（字通谊）记道：“一八九七年，先君三十岁，祖父卒，丧事毕，有远游志。伯祖艺芳公以河东盐法道权晋臬，先君随至晋阳。时晋抚胡蘅生创办新政，设武备学堂、商务局、纺织厂，以艺芳公为督办，所有奏疏函牍皆先君所拟，为胡所赏识，遂延入署中，主内文案兼抚藩两幕。”^{[7]12}1900年，杨宗濂在无锡创办业勤纱厂并嘱杨寿楠主办厂务，是为近代无锡第一家民族工业企业。纱厂开办之初资金不足，遂向两江总督刘坤一借用苏省积谷款十万两，由于杨寿楠“躬亲考核，辛苦经营”，所欠公款很快分期偿清。^{[7]12}这是杨寿楠投身实业之始。同年，杨寿楠以绅富捐奖内阁中书，但因义和团事而未赴京。1901年，杨寿楠北上就内阁中书职，并起草兴办顺直纺织奏议。次年，35岁的杨寿楠又入大学士孙家鼐幕主章奏，“孙每日退朝，必至斋中谈经史，深受教诲”。^{[7]13}

杨寿楠从钟情科举考试到专意经世之学，虽有会试屡屡受挫的客观因素，但总体上看是其主动因应政局变动、顺应时代要求的必然之举，此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读书人的普遍心态。“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杨寿楠正是凭借科举遇挫后追求经世之学积累的良好财政知识素养，不仅为之后在清政府财政部门任职打下牢固基础，也奠定了他在民国时期的发展方向

二、一代新人换旧人

命运关爱有心人，机缘亦说到就到。随着清末新政的推行，国家对具有专门知识素养人才的需求激增。很快，杨寿楠在1903年遇到人生第一次转机。这一年，杨寿楠参加商部考试并取得第17名的成绩，次年分保惠司行走。^{[7]13}此时杨寿楠37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好时期。

① 笔者曾发表《杨寿楠与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兼论两路考察团考察成果的不同来源》（载《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探讨了杨寿楠参与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团的若干史实。除此，杨寿楠人物词条性简介，散见于各种人物集，兹不列举。

1905年,杨寿楠升任商部四司之一的平均司帮主稿,同年被遴选为五大臣出洋考察团随员,随同考察政治大臣载泽、尚其亨、李盛铎出国考察,这是其人生第二次重大转机。清末时期,出洋考察是积累政治资本、赢得人望重要且便捷的途径,时人即言:“风气既开,士大夫言出洋者踵相接,官以考察政治为名者,归辄得美迁。”^{[8]120}而随五大臣出洋,除出洋考察的一般好处外,尤其可以增长见识和才干。五大臣出洋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各国宪政,为中国能否以及如何推行宪政改革提供决策依据,时论认为此次出洋必将助益于中国“握富强之本原,以臻文明之极则”。^{[9]113}对于这样一次关乎国家政治走向并寄托国民热切厚望的考察团,随员的选拔异常严格。负责选拔随员的考察政治大臣极为慎重,“环顾中外,甄采矜慎,各举所知,无敢以夤缘进者”,^[10]“非素有政学资格之员,不能滥竽请托”。^[11]可以说,杨寿楠能够入选考察团,靠的正是他具备财政学素养,得益于科举遇挫之后的知识转向。

杨寿楠在出洋考察过程中,“于各国内政、外交、法律、财政、教育、实业、军备靡不殚精研究”,^[12]眼界为之大开。其友人顾恩瀚亦称,杨寿楠经过出洋考察的历练,“洞悉古今中外政教、礼俗盛衰强弱之原”。^{[5]96}回国后,杨寿楠作为主持人之一,统筹载泽考察团编译书籍事宜,“所译东西洋政治书,编成六十余种”。^{[2]268}其中由杨编订者计十种,包括《英国宪法正文》、《日俄战时财政史》、《日本关税制度》、《日本中央银行制度》、《日本国债史》、《法国司法制度》、《比利时司法制度》、《英国财政史》、《法国国债史》、《比利时财政史略》。^{[6]233-234}更重要的是,杨寿楠深得载泽信任,考察团出洋期间介绍各国制度的奏折,以及归国后载泽所上奏折,多由杨寿楠起草底稿,时人即言:“先生为当代政治家,生平治笈、奏草、章制均已传布海内。”^[13]在考察团政治建言的推动下,清政府于1906年9月1日颁布“仿行宪政”上谕,将宪政改革确立为基本国策。总体看,清末时期国人普遍狂热追逐宪政,鲜有论及宪政制度不足者,而亲历外洋广泛考察各国宪政制度的杨寿楠,则看到了议会制度的重大缺憾,他在年谱中记道:“各国选举亦是金钱运动,论者每痛心于议员之横恣、政党之嚣张,将来代议制之存废,必为世界一大问题也。”^{[2]292}杨寿楠此论,对于时人理性全面地看待宪政制度无疑大有裨益。

1907年,杨寿楠由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奏调,随赴南洋考察,撰成《海南采风记》以及考察南洋各岛华侨商务折,“颇为时传诵”。^{[2]270}1908年3月,杨

寿楠补农工商部工务司员外郎,兼充公司注册局总办、商标局会办。1909年,度支部尚书载泽奏调杨寿楠充任清理财政处总办,旋升补承政厅郎中。据杨自称:“部中重要奏折,皆余与刚甫(曾习经字,曾任度支部左参议)分拟。”^{[2]271}1910年,杨寿楠做为主要参与人,对编制清理财政计划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第一年简派监理官分驻各省,由各省造送财政说明书;第二年试办各省预算,使财政统一于藩司;第三年试办全国预算,划分国家税地方税;第四年实行预算、办理决算;第五年施行会计法,金库制度;第六年各省设立财政司。杨寿楠对此计划十分自信:“自此事权统一,法制严明,使全国财政辐在毂,如纲在网,度支部通盘筹画,调剂盈虚,而清理之事毕矣。”^{[2]272}此外,针对“各部书吏之权最重,户部尤盛,为有清一代秕政”的状况,杨寿楠调各司司员兼理办稿、核算诸务,书吏仅事缮写,“自是积弊尽除,司员之才敏者皆崭然见头角”。^{[2]272-273}

从1901年任职内阁中书起,杨寿楠的官职稳步升迁,其仕途之平坦甚至令他本人也感到意外,其在年谱中写道:“以七品中书六年而至京堂,亦可云速化矣。”^{[2]270}辛亥革命爆发后,杨寿楠并未因乱费事,坚守臣子之道,其记:“时事日亟,本部丞参四人辞职者三。余曰:清室一日不亡当尽一日之责。仍逐日到部办事。至十二月二十五日逊位诏下,余于先一日请假出都矣。”^{[2]273}对于清王朝覆亡,杨寿楠并未表现出震惊和失落,他在年谱中特别记述了清末权贵之间的纷争纠葛,认为这是导致王朝统治崩塌的重要原因:“亲贵中惟泽公负时望,庆等忌之,袁慰廷世凯为庆党,退居洹上,遥握中朝线索。辛亥春,监国将黜庆而用泽,庆党大惧,曰如此则我辈连年计书将成书饼矣,重贿宫监小德张求隆裕后缓颊。后乃召监国曰:奕劻虽耄,终是宗室老成,请缓三月,待其自退以全体面。监国唯唯。庆既留,乃令汤化龙联合各省咨议局上呈亲贵不得干政,意在阻泽公也。三月后,庆不复退。至武昌事起,庆力荐袁入朝,卒移清祚。”^{[2]274-275}显见,在杨寿楠看来,清王朝处权贵纷争之困局,其覆亡实属在所难免。

在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中,科举入仕最为人们认可,尽管杨寿楠非正途入仕,但他并未流露出自卑感和不适感。相反,身处二十世纪初新政改革的历史时代,杨寿楠迅速找到了自己的社会定位,仕途相对通畅,且能够做到游刃有余,其精神和现实上的满足感与科举入仕并无二致。上述情形表明,随着新政改革的推行,单纯具备传统知识结构的官

员,已经很难找到用武之地了,那些具备财政、经济等专门知识的官员则更受青睐。“一代新人换旧人”,已然成为清末中国知识结构转型的重要体现,这种现象的出现,正是读书人的人生抉择和价值取向随着时代演进而不断调适的结果。

三、风雨如磐暗故园

人言“一朝天子一朝臣”,然而,正是对晚清政局的不满失望感使然,杨寿楠对新生的民国政权并未予以敌视,而是充满了期待并积极投身其中。杨寿楠清末任职商部、农工商部以及度支部的经历,使他得到很好的历练并积累了政治资本。民国建立后,杨寿楠依旧从事老本行,在财政部门任职,迎来人生又一高峰。民国元年,杨寿楠任盐政处总办;民国四年任职山东财政厅,“将军省长皆相倚重,事无掣肘”^{[7]16};民国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擢署理财政部次长。^{[14]1}时财政部设两名次长,杨寿楠负责佐理财政,梁思浩负责专办盐务。^{[15]1}民国七年六月,杨寿楠被选为参议院议员,是年九月举徐世昌为总统。同年又被公推为天津华新纱厂经理,后又担任全国棉业督办达八年之久。

杨寿楠对1917年张勋复辟的态度,颇能反映他这一时期政治心态的复杂性。有人诘责杨寿楠在张勋复辟后“转媚张勋”,“故攫得度支部侍郎之职”,其拜客名刺上“前财政次长”与“现度支部左侍郎”并用,以此讽其操守之低劣。^{[16]47}张勋复辟后,杨寿楠确曾得授度支部侍郎职,他在年谱中曾记:“五月十三日忽有复辟之举,余在病假中奉度支部左侍郎之命。”^{[2]287}然而,时人之论则有其片面性。事实上,杨寿楠对张勋复辟之举的态度颇为复杂:一方面,杨寿楠基于中国传统政治道德准则,加之其内心对故国未能全然忘怀,遂极力褒扬张勋对王朝的政治忠诚,认为“少轩此举磊磊落落,功虽不成,足为历史上有名人物矣”。^{[2]287}并分析张勋进京复辟帝制及其失败,原因在于“缺乏政治常识”,“遂为政客所利用”。^{[2]289}另一方面,杨寿楠希望国家尽快步入正轨,表现出浓厚的国家观念,是以认为复辟帝制之举阻碍了时代的发展进步,其言:“使无帝制发生,政治已趋轨道矣。”^{[2]281}杨寿楠对待张勋复辟的复杂态度,展示出从旧阵营里走出来的读书人政治

心理的矛盾态势,可谓具有相当代表性和普遍性。^①

从杨寿楠在民国时期的任职情况看,他尽心尽责,力除弊政,有几件事值得特别提出。首先是整顿税务。1912年,张謇提出以“废纲商,收场产,破引岸”为核心的盐务改革主张,然一经提出即引发“朝野大哗”。杨寿楠则另草改革方案至四五万言,以“清场私化,引界均盐税,平盐价,课食兼顾”为主旨,提交参议院并获通过。^{[2]277-278}1913年,杨寿楠鉴于长芦盐课向用实银,“科目繁碎,平色参差,吏缘为奸”,遂将各类盐课“并为一条鞭,改两为元”,“商民称便”。接着又整理场产、分济邻销,“岁课骤增二百余万”。^{[2]279}在山东财政厅长任上,杨寿楠鉴于“民间不苦税则之重,而苦税目之繁”,遂挑选税收丰富、科目简单者实力举办,专办验契,亩捐,公债三项,其余杂税暂缓,是举效果显著,两年中增收至千万,财政部考核各省成绩时,“以山东为第一”。^{[2]281}其次是经营纺织业。1918年,杨寿楠出任天津华新纱厂经理,“精心辟划,闪电投产”,“人皆歆羡”。这期间,杨寿楠与周学熙密切配合,“一面利用政府力量,发展实业,一面又慎密防止政敌,亦利用政府力量进行巧夺,同时亦防止团体内部不肖者破坏团体利益”。^{[7]19}同时二人“均以财权自主为第一要义”,是以又成立中国实业银行,意在“不全仗其它银行,故不为所操纵”。^{[7]24}

然而,杨寿楠凭借自己敏感的政治嗅觉以及投身政坛的政治实践,深切认识到民国政府依旧国势阽危,时代并未真正进步。他在年谱中写道:“民国建设以来,国势如累卵,朝局如弈棋,群龙无首,海内鼎沸。……名为民国,不知有民;名为国民,不知有国。”^{[2]287}在覆某议员书中亦直言:“民国以来,三莅财部,始则国体虽更,人心未变;继则苞苴,暮夜行动,尚类穿窬;今则贿赂,公开交易,俨同鬻鬻。”^{[17]153}具体看,在杨寿楠笔下,民国乱相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帝制反复。1915年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杨寿楠记道:“京师设筹安会,将复帝制,另各省士民上书公推袁世凯为皇帝,称颂功德几有天与人归之象矣。乃劝进之笺甫奏,讨逆之檄忽来,滇黔兵起,各省应之。项城由小站练兵而起,利用军阀

① 杨寿楠的这种矛盾心境,在其致总统黎元洪书中更是表露无疑:“本月某日,议员谋提案弹劾寿楠复辟时曾任度支部侍郎,不应再做民国官吏,义正辞严,无任愧悚。窃维民国以来,新旧人才杂进,此起彼伏,视若寻常,即复辟授职者不止一人。今该议员于寿楠独加抨击,此中殆别有用心。”杨寿楠:《云谿书札》,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150页。1923张勋年病故后,杨寿楠又作《祭张少轩将军文》,仍然对张勋之忠义极表赞美,文末言:“郁一生忠义之忧,生有自来;懔千古英雄之气,呜呼尚飨。”杨寿楠:《云在山房骈文诗词选》,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91页。

以复清，乃因果相生，种瓜得豆，今日反对帝制者，即当日利用之军阀也。”^{[2]282} 言语之间，点出袁世凯成也军事、败也军事的历史宿命，展现出其对军人干政的强烈不满。1917 年张勋复辟，杨寿楠对此一时期的政治乱局异常反感，其言：“曰绝交、曰参战、曰复辟、曰变法，其中黑幕重重，特以国事为儿戏而已。”^{[2]289}

其次，议员驳杂。民国七年六月，杨寿楠被选为参议院议员，得以近距离观察参众两院的内中细情，其这样描述议员成分之驳杂及其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国会始于宣统二年，曰资政院，其初流品整齐，举动尚循正规。国体初更，召集参议院，旋由各省依法选举议员，始分为参议院、众议院，议员皆以贿选，流品始杂。两院议员分为两大党：一曰进步党。多官僚，工于揣摩；一曰国民党，多革命份子，号为激烈派，气焰甚张。至民国二年，两院为项城（袁世凯）解散，洪宪以后，法统重光，不及一年又被解散。河间（冯国璋）就职，始改订选法，重行选举，是为第二届国会。大抵议员从田间来，学识虽新，于政治实少经验，故主张辄与政府相忤，又监督政府甚严，阁员皆须两院通过，为舆论所摈者，辄遭否决。官僚深感不便，阴谋构煽，而政府与议员遂势不两立矣。”^{[2]291-292}

再次，财政混乱。杨寿楠长期在财政部门任职，对民初财政混乱状况体认尤深。他在 1917 年曾这样写道财政亏空的严重状况：“时承政变之后，政府威信渐替，各省解款不至中央，国库岁入……约八千余万元，岁出为一万万元。”^{[2]286} 政府为解决此问题，往往发行各种长短期公债，但由于不加节制，加之银行操纵其间，发行公债遂“成为投机之事业”，^{[2]289} 以致金融秩序愈加混乱，不仅人民大受其害，政府亦因此失去信用。鉴于此，杨寿楠甚至认为民国较之清朝是开了历史倒车：“自公债政策行，金融界操纵财权，颐指气使。独忆前清时法纪严肃，官商不敢公然交接。”^{[2]299} 此外，贪污之风亦极大影响了财政秩序：“近年贪风日炽，每至年终发款，财政部员司与各衙门领款者，明目张胆争论扣头，至夜分未了。……党司朋比分肥，已成惯例。”^{[2]296} 在致财政总长李士伟函中，杨寿楠更是言辞激烈地言及财政已成崩溃之势：“今日财政，非迎合税司、勾通银行、笼络议员、交结报馆，不能一日安。”^{[17]151}

最后，军阀混战。袁世凯死后群龙无首，国务总理段祺瑞凭借军事力量控制北京政府，与总统黎元洪之间“府院争权，动生齟齬”。^{[2]288} 杨寿楠对军人当政、军阀混战深恶痛绝，他记述直皖战争之根源

在于争权夺势：曹锟、段祺瑞同为北洋派，为“项城时代重用”，由于“权位既高，渐相倾轧”，“袍泽化为戈矛矣”。^{[2]294} 第一次直奉战争亦诱发于派系斗争：“皖派失败后奉、直争权，靳翼青（靳云鹏字）去职，梁燕孙（梁士诒号）为总理，张岱杉（张弧字）为财政总长，叶誉虎（叶恭绰字）为交通总长，皆奉方所推荐也。梁、叶为交通系领袖，而岱杉又以发行九六公债为舆论所攻，吴子玉（吴佩孚字）巡使乃连电力诋政府，政府亦挟奉力以相抗，于是奉直之釁开矣。”^{[2]295}

此外，杨寿楠在 1925 年的年谱中还有关于共产主义传入中国的记录，为我们认识这一过程的曲折性提供了鲜活素材。其写道：“北京学生、工党及无赖游民，揭赤色旗游行都市，围政府、驱阁员、烧报馆，京城秩序大乱。……近年吾国渐染苏俄赤化，盛倡共产主义，于是无业游民藉此组织工会到处演说，以推翻资本家为目标，实则聚众敛财，收捐款以饱私囊而已。工人无知，易受煽惑，少数桀黠者起而附和，多数良懦者不敢抗违，津、沪等处遂屡酿毁厂罢工之举，涓涓不塞，将成江河，设有蹊蹠巢穴之徒利用学说实行共产，则天下之大乱起矣！”^{[2]304-305}

四、归隐山林度晚景

民初政局动荡不平，极大制约了杨寿楠之事业。继华新纱厂之后，杨寿楠又与周学熙合作在唐山、卫辉、青岛设厂，准备大干一场，但终因战乱迭起而成效不彰。^{[7]21} 另如 1922 年杨寿楠出任无锡商埠总办，曾这样述及身不由己之苦衷：“吾深知北京政府简任各商埠督办，不过位置本省巨绅耳，其时军阀势张，兵争迭起，苏浙之战、直奉之战、以至民军北伐，吾邑迄无宁岁，若好大喜功，就地筹款积极，进行地方扰累，一旦中止反恐不易收束。此吾老成之见，宁受不办事之议也！”^{[2]309}

更重要的是，本来希望做出一番事业的杨寿楠，面对民初政局的千疮百孔，其内心的失望情绪与日俱增，遂萌生退出政坛之意。1916 年，杨寿楠请辞山东财政厅厅长之职，他在年谱中写道：“军阀势力渐张，时局倏扰，事不易为，乃托词入都筹饷，到部即具呈辞职，部长挽留，坚辞再三，并保王小宋璟芳继任。”^{[2]284} 最终，辞呈于七月二十四日获准。^{[18]1} 然而，至 1917 年 2 月，杨寿楠又被任命为财政部次长，1922 年擢升财政总长。此时，杨寿楠愈加担心继续仕途难免陷入囹圄，遂拖延不赴：“盖财部屡兴大狱，腥膻之地实不敢居也。”^{[2]296} 但此次请辞不获。1923 年，杨寿楠 56 岁，他在该年年谱中慨叹

为政面临万难境遇,惟有决意请辞:“余自丁巳(1917年)离部迄今不过五年,而财政迥非昔比,国库八九千万之岁入,悉化为公债抵押品。事事皆受掣肘,人人各便私图,非具严厉精覈之手段,不能彻底整理。报馆要求津贴,不应则造谣攻击;议员要求差事,不应则提案抨弹。非饮狂药、酌贪泉,不能自立。外度事势,内揣才力,所抱政策终难实行,灯节后即请辞职。……政海风高,宦途日暮,自知迂腐,甘为病木沉舟矣。”是年七月间,杨寿楠请辞最终获准。^{[2]297-298}然时人对此则颇有遗憾者,同邑辛幹即言:“声绩虽炳,而厄于时势,未竟阙施,君子惜焉。”^{[19]230}此亦杨氏为政得到社会认可之一证。

杨寿楠辞职后,先在天津居住。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奉军南下,“江南各县皆被兵灾,无锡自阴历腊月二十四日起焚掠十昼夜”,杨寿楠遥望故里,在年谱中写下“腊尾年头,故乡日在烽火中也”的悲愤之言。^{[2]301-302}1926年农历8月,杨寿楠归返无锡故里,筑居“云蒔别墅”及藏书之所“裘学楼”等。杨寿楠曾记其结构,言辞颇显恬淡:“行十万里路,仕宦三十年,齿发既衰,始遂初服,归而筑室于城西,以其隙地辟为小圃,而命之曰云蒔。云蒔之地广不四亩,池居三之一,微波沦漪,莹若碧玉。池之上为平台,广三丈许,半为花坞。台之后为楼三楹,曰裘学楼,藏书之所也。下为况梅斋,贮列书画、鼎彝、琴剑、香炉、棋枰、笔床、茶灶,轩窗洞敞,湘帘四垂,吾燕居之地也。”^[20]关于杨寿楠藏书,近代藏书家、学者王謇称“颇收佳籍”,并曾就杨寿楠将所藏宋本《孟东野集》付诸影印咏诗一首:“云在山房从书刻,云蒔漫录记前朝。宋本景印孟东野,真面已胜方柳桥。”^{[21]34}杨寿楠不仅注意藏书,更注重学以致用,曾给子孙写下教训:“藏书不难,能看为难;看书不难,能读为难;读书不难,能记为难;能记不难,能用为难。”^{[3]138}

1927年,“元宵后闻军事消息日亟”,杨寿楠遂于正月二十一日携家眷启程赴津,二十三日抵达天

津。居津期间,杨寿楠曾筹谋改组华新纱厂,推举周学辉为常董,周叔弢为经理,自己仅拥专董虚名。但纱厂改组后,主事者大肆扩建,藉以从中渔利,终致“营业亏空,周转困难”,最终在杨寿楠“极感愤慨”的反对声中售于日商。^{[7]22}至此,杨寿楠见大势已去,“乃坚决辞去所有纱厂、银行一切名义,退而与当代名流结社唱酬,以文史自娱,编写《云在山房类稿》,收集平生所著诗文、诗话、漫录、杂记、丛录等十余种付印行世”。^{[7]25}《云在山房类稿》共计二十种书目,计原刻十五种、续刻五种。^①尤值一提的是,其中的一种即《云蒔漫录》,还被刘麟生译成英文,《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曾刊文这样介绍该书:“此书铺陈吾国人生观念,题蕴毕宜。其所言者皆生平甘苦有得之言,益以先辈嘉言懿行,抉择严谨,遣词俊雅,言简意赅,读之令人神观飞跃。此种书为外国人所不易了解,译者以娴美之西文,传深远之至理,极见匠心,于传述吾国文化深有裨益。”^{[22]8}

除著书立说,与友朋诗歌互答、品评金石书画,也构成其晚景生活的又一重要内容。杨寿楠自称“生平作诗不下三千首”,^{[23]69}推测有相当部分当在辞官后所作。居津期间,杨寿楠加入冰社、梦碧词社^②等社团,是非常活跃的骨干成员。1928年大年初二,冰社同人集于寒碧簃,携所藏金石书画互相评玩。郭则沅出示文天祥蝉腹砚,章钰携黄道周断碑砚,皆为曾燠题襟馆旧藏,^③对于此一佳话,同人推杨寿楠赋之,遂作《题襟馆双砚歌》,其中有言:“华灯照座光玲珑,锦帙玉笈排重重。就中双砚最殊绝,宝气奕奕辉星虹。”^{[23]106}另如《从坊肆尘架中得前朝爵秩全函数十册排比丛残戏系以诗》一首,则描写退隐生活之恬淡:“卿相偕丞尉,尘中一例埋。为蟬添俸料,如鲫列官阶。末路功名贱,清时仕宦佳。兰台曾注籍,旧物付推排。”^{[23]121}这首诗亦庄亦谐,既写出了对仕宦之途的感慨,也显示了意外得到图书的欣喜。另外,我们从署名炽昌者所做《题杨寿楠先生柳溪图》两首,亦可见其归隐之趣:

① 原刻十五种包括:《思冲斋文钞》(赵芾序,顾恩瀚跋)、《思冲斋文补钞》、《思冲斋文别钞》(钱基博序)、《思冲斋骈体文钞》(丁闇公序)、《思冲斋骈体文补钞》、《思冲斋诗钞》(樊增祥序,钱海岳序)、《思冲斋诗补钞》、《钵社偶存》、《鸢摩馆词钞》(汪曾武序,郭则沅序)、《鸢摩馆词补钞》、《藏盒幸草》(杨锺钰序)、《云蒔诗话》、《云蒔漫录》、《觉花寮杂记》(徐沅序)、《贯华丛录》(赵椿年序)。续刻五种包括:《秋草斋诗钞》、《秋草唱和集》(夏仁虎序)、《云蒔书札》、《苓泉居士自订年谱》、《趋庭偶录》(许国凤序)。杨寿楠:《云在山房骈文诗词选》,第71-72页。

② 1925年,郭则沅、李放等人在天津成立冰社,后改名须社,召集同人作词赋诗,最后一次集会在1931年,地点即是在杨寿楠的云在山房举行。参见杨传庆:《清遗民词社——须社》,《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梦碧词社的社课以词为主,兼及诗歌、诗钟,创始人寇泰逢,寇字梦碧,以之为名,社员近百人,杨寿楠为主要成员。参见袁志成:《晚清民国词人结社与词风演变》,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7页。

③ 曾燠(1759-1831),字庶蕃,一字宾谷,晚号西溪渔隐,江西南城人,官至贵州巡抚。清代中叶著名诗人、骈文名家、书画家和典籍选刻家,被誉为清代骈文八大家之一。为官之余,辟“题襟馆”,延纳四方名流唱和。

“其一：垂杨溪畔绿依依，款乃声中觅酒旗。疑入西湖最深处，恰从柳浪听莺归。其二：石壁撑天气自雄，水云乡里绿蒙茸。万山遥送青葱翠，人到蓬莱最上峰。”^{[24]124}

通过庋藏书籍、著书立说、诗歌互答等途径，以求得精神上的充实，堪称清末民初读书人“理想”的生活状态，杨寿楠正是如此。在乡居期间，杨寿楠度过了人生中最为平静安详的时光：“归里不问地方公事，与诸戚友流连觞咏，放浪湖山，游子归故乡，颇多乐趣，十年中最愉适之日也。”^{[2]307}但是，这种人前的愉适和表面的恬静，远远不是杨寿楠的全部心境。身处“江湖之远”的杨寿楠，内心依旧会不时涌动忧怀国家前途命运的情愫，他在一次雅集上就曾写下这样的诗句：“独上危亭满目悲，西风斜照雁来时。五朝残劫楼台在，九塞边声草木知。石气清能苏病骨，湖光凉欲沁诗脾。黄花应笑题糕客，不啖金英啖玉糍。”^{[25]33}

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杨寿楠感伤时事，赋《秋草》四章，其中一首以《双调忆王孙》为词牌，词曰：“远近关河残照里，空满目，冷烟荒翠。裙腰黯澹玉钩荒，渐瘦到，红心死。青袍一例伤憔悴，似老去，庾郎身世。衰蛩化碧照秋坟，是万古，伤心地。”^{[23]137}民国时期著名的诗词创作和研究的学术期刊《同声月刊》，在1941年第1卷第10号选登“鸯摩馆词四首”，其中即有此词。《秋草》公之于众后，海内传诵，和者百余家，后辑成《秋草唱和集》，时人因称杨寿楠“杨秋草”。^{[26]132}1948年农历12月7日，杨寿楠因肺炎病逝于天津云在山房寓所，享寿81岁。^{[7]30}

结语

近代以来，中国开始步履蹒跚地迈入迥异于前的新时代，但这个过程似乎来得突兀遽然。生活在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读书人，不仅要面对政局动荡带来的冲击，还要适应随之而来的社会结构的变迁、新旧体制的交替。探讨杨寿楠的理想事功及其人生境遇，不仅仅出于对个体历史生命的人文关怀，更是深入认识清末民初波谲云诡时代变局的需要。从杨寿楠一生之经历，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杨寿楠自幼接受的是传统儒家教育，稍长则因应时势所趋，主动将学习重点转向经世之学，并通过参加部选考试步入仕途。在这个过程中，杨寿楠并未表现出自卑失落之感，反而将此一转变视为必然之举，突出反映出时代转折变迁对读书人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其次，面对清末民初的

政权更迭，杨寿楠心理上并未产生多大震惊和失落，相反他基于对清末混乱政局的体认，认为此为历史发展之大势所趋，对新生的民国政府充满期待，因之以一种积极的精神面貌投身民国。此一过程，鲜明展现出杨寿楠这样一位从旧营垒里走出来的读书人身上所具有的浓厚国家观念，换言之，杨寿楠对清王朝的政治忠诚，并不比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来得强烈；其三，杨寿楠对民国政府一度充满期待，也一直在尽心竭力去实践读书人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但遗憾的是无论其任职官场还是经营实业，其内心的理想追求在动荡的社会现实面前终难得偿，政局机阻不安成为制约个人理想事功的最大障碍。杨寿楠曾用十六字回顾其人生：“沧流东逝，晷景西驰；追念平生，如梦如幻。”^{[2]310}这不仅是杨寿楠对个人境遇的感慨和无奈，更是对其所处时代的痛惜和哀叹。

参考文献

- [1] 来新夏. 传教士的贡献不该被埋没[N]. 中华读书报, 2013-08-14.
- [2] 杨寿楠. 苓泉居士自订年谱[M]. 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第192册.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 [3] 江庆柏. 近代江苏藏书研究[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0.
- [4] 汪曾武. 外家纪闻[M]. 杨寿楠跋. 云在山房丛书第3册, 铅印本, 1928.
- [5] 顾恩瀚. 竹素园丛谈[M].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6.
- [6] 杨景燧, 杨景燧, 杨景燧. 趋庭隅录[M]//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7辑.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4.
- [7] 杨景燧. 近代无锡杨氏先人传记事略类稿·先君味云公事略[M]. 北京: 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准印, 1991.
- [8] 王锡彤. 抑斋自述[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1.
- [9]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10] 刘若曾存札[A].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档号: 甲296.
- [11] 徐大军机调员[N]. 大公报, 1905-07-30.
- [12] 杨寿楠. 云在山房类稿[M]. 唐文治序. 铅印本, 不著出版年.
- [13] 杨寿楠. 云谲漫录[M]. 许国凤跋. 云在山房丛书第2册, 铅印本, 1928.
- [14] 大总统令十则[J]. 财政月刊, 第4卷第41期, 1917.
- [15] 大总统请命由署次长杨寿楠代理部务俾得专理盐政文[J]. 财政月刊, 第4卷第42期, 1917.
- [16] 天忼生. 复辟之黑幕[M]. 上海: 翼文编译社, 1917.

- [17] 杨寿楠. 云蘧书札[M]//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17 辑.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 [18] 大总统策令四则[J]. 财政月刊,第 3 卷第 33 期,1916.
- [19] 辛幹. 无锡艺文志长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20] 杨寿楠. 思冲斋文钞[M]. 云在山房类稿第 1 册,铅印本,不著出版年.
- [21] 王謇. 续补藏书纪事诗[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 [22] 宝. 云蘧漫录英译本[J]. 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第 2 卷第 6 期,1943.
- [23] 杨寿楠. 云在山房骈文诗词选[M]//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17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 [24] 炽昌. 题杨寿楠先生柳溪图[J]. 四中周刊,第 76 期,1929.
- [25] 杨寿楠. 九日岚影亭即事分得燮字[J]. 华文大阪每日,第 4 卷第 3 期,1940.
- [26] 政协无锡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 无锡历史名人传第二辑[Z]. 内部资料,1989.

(责任编辑:闫卫平)

Yang Shounan and his Era

PAN Chong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Histor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China)

Abstract: Yang Shounan was born in a famous family of Wuxi. He became an official relied on his good financial knowledge accumulated in his youth but not through imperial examination although he had took part in this examination several times. He was active in politics and business communit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 political experience of Yang seemed smooth, but the gap between his ideal and social reality was so huge, which caused serious innermost loss and hesitation. In the end, Yang resigned from his official position and wrote books and poems in his late life. The twists of Yang's personal life showed the scholars in his era had great changed their values, and the political instability became the biggest obstacle restric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eople.

Key words: Yang Shounan;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imperial examination

(上接第 30 页)

On the Thoughts of Market Economy of Confucianism in the Pre-Qin Period

WEI Ming-kang, WAN Gao-chao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School of Govern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pre-Qin period is the first golden period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in Chinese history. As the theoretical expression of this golden period, Confucianism lists "scholar-bureaucrats, farmers, artisans and merchants" as "the four cornerstones of the country", holds that market trade is a mutually beneficial behavior between the buyer and the seller, and advocates that the best way of the government to manage the market economy is "the management by non-interference". These ideas of Confucianism in that period can provide helpful theoretical resour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arket economy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 words: Confucianism in the Pre-Qin Period; Market Economy; Confucius; Mencius; Mao Zedong; Deng Xiaoping